◎美在生活

扇子的生活美学意蕴

李修建

在中国传统社会，扇子与民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烈日炎炎似火烧，热得受不了，一扇在手，诚能纳凉降暑。每当夏日，上自王公，下至黎庶，必备扇子。又因古代中国人极具审美情思，即令对普通器物亦加意营造，这就使扇子具有审美色彩，显出艺术特质。所以，除了实用，扇子又有礼仪、审美、身份认同、文化表征等多重功能。

帝王出行的仪仗扇，诸葛亮的羽扇，扑流萤的轻罗小扇，《西游记》里的芭蕉扇，孔尚任的“桃花扇”，文人手持的折扇，百姓用的蒲葵扇……大家都耳熟能详。中国的扇子，可谓异彩纷呈、渊源深厚。本文选取4种最典型的扇子，谈一谈它们的文化和美学意蕴。

▲桃树仙鹤图乌木雕花柄团扇，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于非闇、傅增湘荷花翠鸟·书法成扇

◀18至19世纪，中国出口西方国家的羽扇，现藏于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羽扇：名士之风流，隐者之高操

古时条件简陋，树叶、毛羽等物是最易获得的制扇材料，所以羽扇出现甚早，文献中有“羽扇之制，起自殷高宗”之说。周王的仪仗中，已有扇翣，用雉鸡之羽制成，意在障尘蔽日，增添帝王威严。后世羽毛的取材，又有孔雀、白鹤、老鹰、大雁、鹳、雕之属。

汉魏六朝时期，羽扇先是流行于江南地区。西晋灭吴，名士陆机等人入洛，将使用羽扇之习带入中原，时人“翕然贵之”。陆机与傅咸所写《羽扇赋》，道明了这一器物的流传过程。

最著名的羽扇用户，自然是诸葛亮。由于小说和戏剧的广泛传播，诸葛亮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得到脸谱化的定型，即《三国演义》中所云“头戴纶巾，身披鹤氅，手执羽扇”。魏晋时期，以羽扇指挥战争的，除了诸葛亮，还有顾荣。西晋末年，陈敏叛乱，占据江东，顾荣手执白羽扇，麾军击败陈敏。又有东晋道士吴猛，即二十四孝中“恣蚊饱血”的那位，拥有神通，曾用白羽扇画水渡江，不假舟楫。

用仙鹤等毛羽制成的羽扇，色白质轻，很受文士赏爱。梁简文帝、文学家庾信，唐宋众多文士，如张九龄、李白、白居易、苏轼、陆游、梅尧臣等人，都有相关诗赋，吟咏白羽扇。在古代文学世界中，羽扇常与纶巾、芒鞋相提并论，象征着名士之风流、隐者之高操。如“手持白羽扇，脚步青芒履。闻道鹤书征，临流还洗耳”“羽扇纶巾人入画”“纶巾羽扇五湖间”“羽扇芒鞋尘世外”“纶巾羽扇颠倒，又似竹林狂”“纶巾并羽扇，君有古人风”，不胜枚举。羽扇，可谓建构了中国文人的隐逸世界与高洁人生。

团扇：深闺女之寂寞，淑女之妩媚

自西汉至明代，在被折扇取代之前，团扇广为使用。团扇状为圆形或椭圆形，以扇柄为中轴，左右对称，用竹木做架，以优质素纨做成，又称纨扇。所谓“青青林中竹，可作白团扇”“新裂齐纨素，鲜洁如霜雪”，齐纨楚竹，最受称道。圆、白、轻、净，是团扇的几个特点。所以，古人常以明月作比：“裁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手中白团扇，净如秋宵月”。

团圆的纨扇，以“合欢”名之，本是爱情的象征。不幸的是，团扇自始就与一个失意的才女关联在一起，那就是班婕妤。班氏德才美貌兼备，起初深得汉成帝宠爱，后来成帝移情赵飞燕姊妹，班氏失宠，受到贬抑，寂寞深宫，以诗文聊抒孤郁。她最著名的诗作便是《怨歌行》，又名《团扇诗》。诗中，她把自己比作团扇，虽在夏天为君王所用，却常恐秋季来临、天气转凉，没了用处，遭到抛弃，“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这一比喻，有着撕心裂肺的力量，戳中了当时为人妇者甚或为人臣者的痛点。自比香草美人的屈原，何尝不是怀着这样的心态？

于是，团扇在后世的文化语境中，近乎成了寂寥女性的表征。中国人的审美心理最好伤春悲秋，团扇又与此心理形成契合。我们在唐诗宋词中听到的多为类似的腔调：“谁怜团扇妾，独坐怨秋风”“柳枝团扇别离多”“罗袖伤春晚，纨扇惊秋换”“繁华事逐东流水，团扇悲歌万古愁”。

除了抒发寥落之情，在实际生活中，团扇还有很多功能，比如手握轻罗小扇，或扑打流萤，显其活泼灵动；或以扇障面，隙中窥人，欲说还羞，恰如西子捧心，增益妩媚之态，尽显女性之美。男性当然也用团扇，不过，团扇的审美属性及其体现出的文化心理，使其更与女性关联在一起。

折扇：斯人之必备，文人之标配

明清时期的读书人，审美形象往往是头戴方巾，手摇折扇。清人李汝珍所著《镜花缘》，描述了一个情节：主人公林之洋等人途经淑士国，来到一家酒楼，只见酒保儒巾素服，戴着眼镜，手拿折扇，一派斯文模样，招呼起客人，满嘴酸文假醋，惹得林之洋大发雷霆：“你再‘之乎者也’，俺先给你一拳！”酒保吓得显出本相，连说“小的不敢”。看来，酒保要扮斯文，折扇是必备行头。

学界基本认定，折扇源自日本，北宋时期经朝鲜传入中国。宋元时期，偶见使用折扇的记载，至明代永乐年间，统治者大行推广，折扇流布天下，渐取团扇而代之。小小的折扇，承载了东亚三国文化交往的史实。

折扇又称聚头扇、撒扇，用竹木与纸张制成，收放自如，携带方便，更兼适合写字作画，可以彰显学养才情，因此为读书人所喜，市场很大。明代小说《今古奇观》中讲，一个名叫文若虚的，乃苏州人氏，听说北京扇子好卖，便置办了一些：上等的，金面，做工精巧，又求得沈周、文徵明、祝枝山等名人诗画，能值几两银子；中等的，上面的名人字画，乃是伪作赝品，出自专事此道的人物之手；下等的无金无字画，能卖几十钱。此虽小说家言，却不妨视为当时社会生活的写照。

文人好扇，遂将其美化、雅化，除了扇面上的书画，还有那附着的扇骨、扇坠、扇囊、扇盒，都极讲究，成为文玩古董。《红楼梦》中的石呆子，藏有几把旧扇，材质是湘妃、棕竹、麋鹿、玉竹，上面有古人写画真迹，石呆子爱之如命。后来，这些扇子却被贾赦夺去，搞得呆子自尽而死。民国时期的笔记里也常有记载，琉璃厂的古董铺里，将折扇与笔墨纸砚一同售卖，其中不乏制扇名家的作品。

17、18世纪，中国折扇远销西欧，深受上层社会的欢迎，富丽精工的折扇成为其标示自我身份和贵族品味的象征。安格尔画中的法国贵妇人，就常常手持折扇。折扇，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载体。

蒲扇：日常之所需，民众之美学

宫廷与豪贵所用扇子，材料、工艺及装饰皆极考究，常以象牙、玳瑁、乌木、紫檀、红木、黄杨为扇骨，又经名工巧匠之手精雕细琢，华丽名贵，以彰显其主人身份地位。普通民众则只能因陋就简，向自然取材，制作日常所用的扇子，最常见的便是蒲葵扇。蒲葵为常绿乔木，生长南方，以广东新会为著，叶子最宜制扇，质轻价廉，便于使用。

东晋时期，蒲扇已广泛出现于百姓日常生活，有两个典故最为知名。其一，一位老妇人卖六角竹扇，王羲之见那扇面光洁，便写上五个字，惹得老妇人很不高兴。不想扇价倍增，老妇人再求写字，羲之就笑而不应了。百姓之扇，实用为先，质朴无华，不事雕饰，此乃民众的审美旨趣。那买了羲之写扇的，自然意不在扇，恐非普通百姓了。这一故事虽说的是竹扇，就民众的美学追求而言，与蒲扇并无二致。

其二，谢安有一同乡，任职广东中宿县，罢职返家，因囊中羞涩，从当地批发五万把蒲葵扇，不料滞销在手。此人拜会谢安，说明情况，谢安随意捡出一把，拿在手中扇动。此举具有巨大的明星效应，以至扇子营销效果惊人，京城人氏，无论士人还是百姓，争相抢购，扇价翻了数倍，很快卖光。这一事件，大大增加了蒲葵扇的知名度，也成为诗文中常用的一个典故，如苏轼诗云：“百金竞买蒲葵扇，不必更求王右军。”

后世，亦不乏夸赞蒲扇之功者。如清代屈大均的《广东新语》中提及：“蒲葵风最美，胜于他扇。”清末王闿运亦有诗云：“苏杭细丝京都工，世人争买夸玲珑。宁知轻盈满怀月，不及蒲葵大扇风。”都是从功能上着眼，体现出实用理性。

蒲扇所承载的，还有对传统生活方式的记忆。炎炎夏季，找一荫凉，三五乡人，围坐一起，手摇蒲扇，喝点粗茶，谈天说地，谈古话今。或如白居易：“坐把蒲葵扇，闲吟三两声。”那样的生活，是缓慢而舒适的；那样的日子，是悠闲而惬意的；那样的心境，是沉潜而欢畅的。

现代社会，扇子早已不是日常必需，但其所承载的历史与文化记忆，依然值得我们咀嚼回味。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明密码

石家河遗址：长江中游史前文明的代表

杨雪梅

在刚刚评选出的“2016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中，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作为新石器时代考古项目的代表成功入围。评审专家认为，近年来石家河发掘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使人们对长江中游地区文明化进程有了新的认识。作为距今5000年至4000年千余年间长江中游地区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最高文明代表，它的各种新探索、新发现对于中华文明探源的意义不言而喻。

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已经陆续进行了60多年。它是1954年在南方进行相关的水利工程施工时被发现的。当时考古队在石家河遗址南部的杨家湾、罗家柏岭、石板冲和三房湾4个地点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遗存，尤其是在罗家柏岭揭露出一处与制玉有关的建筑遗迹，出土了包括如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有“中华第一凤”美称的玉凤在内的一大批精美玉器，从而拉开了石家河遗址及石家河文化研究的序幕。那枚玉凤形体稍小，团身直径只有4.7厘米，但冠羽后卷、长尾两歧，纹饰都采用减地阳刻技法，表现出高超的玉作水平。

玉凤，石家河遗址出土，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石家河遗址才真正开始进行系统的考古，意图建立起这一考古学文化的序列框架。其中在谭家岭发掘400多平方米，揭示出三个时期的文化堆积，反映了从油子岭文化到石家河文化的发展过程；在肖家屋脊发掘6000多平方米，新出土100多件源自瓮棺的精美玉器。聚落考古调查发现，石家河遗址是以石家河古城为核心、由39处地点构成的庞大聚落群，古城将诸地点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发现的石家河古城面积达120多万平方米，其外围有宽阔的城壕，是当时我国确认的规模最大的史前城址，凸显出石家河遗址在长江中游地区乃至我国史前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与价值。1996年，石家河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持续深入以及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需要，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工作自2008年开始再次展开，主要目的是探讨石家河遗址及其所代表的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希望通过对石家河遗址周边100多平方公里范围内进行区域系统调查，初步了解该区域史前不同阶段遗址的基本分布与特点。此次考古发掘的收获令人惊喜。

首先是新发现了谭家岭古城，它位于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城壕内面积达26万平方米，始建年代推测应属于最早的油子岭文化晚期，也就是距今约5000年前，那正是中华文明形成的关键期。谭家岭古城应该是距今约4000年的屈家岭文化晚期、120多万平方米的石家河古城兴起的重要基础。这也是石家河遗址获得2016年度十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实际上，在石家河遗址发现的最早遗存与距今7000多年的城背溪文化比较相似，但发现的材料非常少，整体文化面貌不清。目前石家河遗址考古学文化序列与谱系比较清晰的是距今5900年至4000年这一阶段，其文化发展序列是油子岭文化（距今5900—5100年）、屈家岭文化（距今5100—45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500—4200年）和后石家河文化（距今4200—4000年）。

其实，石家河遗址的聚落结构大致存在一个从聚集到分散的变化过程。比如油子岭文化时期，聚落中心从龙嘴古城北移到谭家岭古城，但其周边的相关聚落少有发现，聚落的等级分化尚不明显。屈家岭文化时期，以石家河古城为中心的聚落群开始形成，其周边聚集的聚落近10处，且出现明显的聚落等级的区分；聚落内的功能区划基本形成，如石家河古城内的谭家岭主要为居住区，而邓家湾主要为祭祀区。新的考古发现则证明在石家河文化时期，石家河遗址的中心地位确立，聚落等级分化加大，聚落内的功能区划进一步强化，三房湾成为重要的手工业作坊区，石家河古城外的印信台则成为专门祭祀场所。

2016年记者曾经去过石家河古城西城壕外侧的印信台发掘现场，考古人员在这里揭露出5座人工堆积的台基、百余座瓮棺葬，台基之间的低地填埋大量的厚胎红陶缸、红陶杯。红陶缸上发现不同形象的刻画符号达40多种，可能已具有文字的功能。大量陶缸排列有序、口底相接、相互套接，部分缸体上还有刻划符号，可能是一处石家河文化晚期多次举行祭祀活动的专门场所。

考古人员在谭家岭遗址寻找大型建筑遗迹时，意外发现9座瓮棺葬，其中5座有玉器随葬，共发现各类玉器240余件，这是石家河遗址玉器又一次大规模集中发现。这些玉器有以往不多见的神人头像、双人连体头像玉玦、玉虎、玉鹰等，表面均有精美的线刻图案、复杂的透雕和细如针尖的钻孔，普遍使用的圆雕、透雕、减地阳刻、浅浮雕线刻工艺，代表了史前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玉器加工工艺的最高水平。不过，随葬玉器的瓮棺葬俗不是本区域的文化传统，应该是来自其他文化的影响。

湖北省考古所所长方勤认为，石家河遗址提供了阐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的生动材料。作为史前中国传统的六大文化区之一，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文化存在自身的发展道路和特点：从油子岭文化晚期开始，也就是五千年前，以石家河遗址为中心的长江中游地区真正开始文化一体化进程，经过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整合聚散，形成了一个文化高地，开始影响周边的文化，同时也接受周边文化的影响。石家河时期出土过一个玉龙，外型与玉猪龙很像，一看就是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还有牙璋，也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而在后石家河时代，文明继续往外扩张，南方与中原文明通过多种渠道进行交流，比如在邓家湾出土的铜片，是长江流域最早的铜，它也许会在以后的文明进程中扮演更多的角色。

听美国学者安乐哲解“聖”字

李心峰

在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台湾中华文化总会共同主办的第七届海峡两岸汉字艺术节上，我受邀代表大陆艺术家讲话，谈了这样一个主题：“以汉字为载体，以圣人为榜样，做文化沟通的达人”。

我的发言是从美国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对一个中国汉字的创造性解释谈起的。安乐哲是美国当代哲学家，也是成就卓著的汉学家，曾于2013年荣获第六届世界儒学大会颁发的“孔子文化奖”。在他的众多著作中，我发现他对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汉字作了富有创意的阐释。这个汉字就是圣人的“圣”。这个圣字，用的是繁体字的“聖”，他是对繁体字的“聖”作了新的解释。

“聖人”，按一般理解，就是品德特别高尚的人。“聖人”的“聖”，从辞源学上讲，《说文解字》对“聖”字的解释是：“从耳，呈声。”意思是，左边是“耳”，右边的“呈”表示读音。就是说，这个字，它的含义是从左边的“耳”获得的，它的读音是从“呈”这个字的声获得的。过去一般比较重视耳朵的含义。什么是“聖人”？聖人就是特别善于倾听、理解别人的表达的人。所谓“耳顺”之谓“聖”也。所以，从古至今关于孔圣人的塑像或画像，都有一个特别巨大、下垂的耳朵。

上面的解释，主要是从“聖”字中的“耳”这个构成要素作出的，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解释。安乐哲对这个“聖”字，则有独特的理解。他特别关注到“聖”字中“呈”字的含义。在他看来，“呈”字不仅是一个取声的偏旁部首，实际也有含义，因为“呈”字从“口”。安乐哲从这里获得启发，认为要做“聖人”，不仅要善于倾听，还要在倾听、理解后，善于用自己的“口”去说，去向他人表达，这样才能成为“聖人”。也就是说，成为一个“聖人”，要特别善于倾听方方面面的见解、意见、争论、争鸣，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充分表达个人见解，努力获得广泛认同，从而推动人们的行动，推动事物向前发展。的确，一部《论语》，不就是记载孔子如何倾听各位弟子的观点、志向、疑问、论争，再将他自己的理解、思考、观念、思想向众弟子乃至更广大的人群循循善诱、不厌其烦地去表达的吗？总之，孔子之成为“圣人”，不只因其“耳顺”，还因其“口敏”。当然，他还有超越凡人的伟大的心灵、博大的胸怀与高贵的品德。

安乐哲的解释，给我以非常大的启发。首先，安乐哲作为一个美国学者，一个来自西方文化体系的汉学家，是立足于对汉字的理解，才能够对“聖”字有这样一种全新的阐释。这表明，汉字作为一种文化沟通的媒介，有它独特的优势和长处。因此，作为中国人，作为汉字文化的创造者、接受者、传承者、运用者，我们要珍惜汉字的文化价值，应该有一种建立在数千年汉字历史上的自豪感，应该有发自肺腑的文化自信。

其次，他对“聖”字的创造性解释还启示我们，虽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成为圣人，但可以努力向圣人学习，不仅要善于听、善于理解，还要善于表达。每个人都应努力做一位善听会说、善于进行文化沟通、交流的“达人”，真正有效地推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其实，由此推衍开来，有了这样一种善听会说的“圣人”功夫，小而言之，会有利于你我他个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大而言之，则有利于中国与他国、中国与世界的文化沟通与交流。唯乎此，费孝通先生倡导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境界，庶可得以实现。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副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欢迎关注《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艺部微信公众号
“文艺菜园”